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丛书

国家重点图书

国际关系理论

——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

宋伟 著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丛书

国家重点图书

国际关系理论

——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

宋伟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宋伟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320-3572-7

I.①国… II.①宋… III.①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IV.①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5685号

责任编辑 董龙凯

装帧设计 赵志文

国际关系理论

——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

宋伟 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9 插页 3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3572-7/C·0008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序

拿着宋伟博士送来的厚厚书稿,对这位不懈努力、保持进取的年轻研究者的敬意油然而生。近几年学界关于国际关系研究“陷入危机”的议论不绝于耳,作者恰恰在这个时候不惧舆论、直面挑战,经过艰辛探索和用心写作,奉献出《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一书。单是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他的勇气和韧性超过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我自己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有段时间,略知个中甘苦;拜读这部体例规范工整、文字细密严谨的专著,不能不赞叹后生可畏。

大体阅读此书之后,产生了不少感受,有些值得我以后慢慢思考;这里只谈一点印象最深的地方,也是自己感觉最难和困惑之处,既向作者请教,也供读者参考。

我理解,本书的旨意,是把时下人们常说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被称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那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来看待和梳理,看看它有哪些核心概念和因果逻辑,什么样的知识、“领地”和方法能划入这一学科的“共有知识”。如同牛顿的三大定律构成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一样,国际关系学如果真能成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的“物理学”,它也一定有相对独立的特性,有本质性的自我规定,有区别于其他分支学科的范畴与路径;与物理学类似,科学性质的国际关系学理应发现可供检验的精确证据,有严格的检测和实证过程,也因而能够推导和预测未来。比如说,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国际关系学向他们提供的,应当是对所涉及议题的精确分析,对问题的严格界定,对主变量、次变量、干扰变量各自的明确说明和相互关系的系统看法,以及在此基础

上的措施建议。循着这一思路,宋伟博士查阅了浩瀚的文献和史料,经过反复思考权衡,最终选定国际关系研究中比较符合标准的三个理论群,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把它们视为构造“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的基石。全书的主要篇幅,便是论述这三大主义何以为相对成熟的社会科学理论,它们的解释性、可证伪性和简约性怎样判断与延展,它们的核心概念、因果关系和理论推导,为什么已经或最终将成为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内核部分——恰似万有引力定律构成现代物理学的基础那样。在全书的结尾处,作者沿着顺理成章的上述线索,提出两个重大建议:第一,在理论层面,国际关系学研究下步发展的主要方向,是脱出现有的繁多纷乱却缺乏共有知识话语的解释性国际问题讨论,着力创建更加系统和有力的“规范性理论”,即符合前述科学标准的形而上之“学”;第二,在现实层面,把探究重点放在外交政策理论领域,力争创造出国家层次的、有普遍意义的外交政策分析理论,甚至是针对某一类国家的“外交特色论”。作者用自己的艰苦努力及包括此书在内的大量著述,敦促更多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把提供从哲学思想到具体方案的国际关系学,作为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伟大使命。

在我看来,作者触及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瓶颈”——如何建立共有知识和判别标准,使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变得更加可能。诚然,过去几十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和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见证了几次重大的跃进,一次是从思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学者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另一次是摆脱单纯引进和模仿的路径,试图建立更加自主的、有中国意识和视角的学问。这中间有大量的投入,有无穷的激励,有诸多的著述,有层出的安排——不管从什么角度观测,不论与哪个国家相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正在经历一个繁荣兴旺的上升期。但是,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感到了一种“失重现象”,正如几年前我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的绪论里指出的那样,“看上去,中国国际关系学目前是一种趋向多元化的可喜局面:它既是研究观点、研究方法的多样,又是思想流派、理论学派的多维,还是探索领域、归属类别的多元;没有人怀疑,这些多样、多维和多元的情势,无论广度或影响力都是史无前例的,都可算了不起的进步。然而,在这种繁荣兴盛的现象背后,不仅存在着深刻的认同危机,而且有迷失在多元化森林里的危

险。这是一种以往未曾有过的‘失重’。多元化势头的形成,是对长期思想专制的一种挑战和反动,而持续的多元化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理论神像的坍塌和权威话语的丧失,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服从老的训条戒律,是无穷尽的求新异、‘非传统’。于是,一个严肃但令人困惑的学理问题提了出来:在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盛行的现时代,在思想多元化刚刚萌生的当代中国,是否还存在值得向我们的读者、受教育者和公众推荐的国际关系‘经典’?如何评判被推荐作品的水平,由谁来提名和认可,又怎样确认不同理论的效用?如果说相对而言各个流派学派的作品水准尚可,在特定的‘圈内’大致认证的话,整个学科范围的规范、权威性以及经典性质怎样认知和规定?假设求新异、‘非传统’的多元化努力,代表着有生命力的东西,代表着崭新的创造性过程,那么这些新东西的价值是什么?整个过程不同阶段的区分点在哪里?有没有特定的界限或标志?是否还存在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的不同观点、流派、类型都可以接纳的共同话语和知识平台?显而易见,假使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均为否定的话,就有可能加剧目前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各说各话、互不往来’,从而无法推动学术研究的正常批评与水平提升”。“不妨以经济学——一个比较发达的学科——作为参照系,看看国际关系学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自然也有自己的问题与困惑,某种程度上同样存在‘中’、‘西’、‘马’的对垒,但必须承认,经济学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知识领域或者说学科,尤其在经过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以后,这一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概念体系越来越深入人心,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许多假定在中国像在其他市场经济体一样被理解和接受,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不同角色逐渐明确,供求关系和价格决定的过程日益透明,经济现象的评判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有了更大的共通性,人们至少是用‘相同或近似的语言’切磋争辩。正因如此,可以说,不管存在多么大的分歧,面对市场经济提出的各种挑战,经济学家探讨的‘假问题’比较少,探讨问题时水平的高下容易鉴别,在经济领域中外交流比较容易;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并没有放弃放慢多元化的进程,但它大体保证在‘同一个平台’上推进。在我看来,现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仍缺少这样一个‘平台’,或者说共同知识的架构”。不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失重现象”,中国国际关系学是很难有大的作为的。可喜的是,针对上述“失重现象”,《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

科学》一书作出了重大尝试,给出了作者的思考与回答。我认为,从作者思索的方向、写作的路线、成果的规范判断,这本书属于真正“理论的理论”,在知识进步与发展的光谱上留下了作者个人的印记,其创新性和难度均远远超出时下很多叫得响却未必站得久的作品。不论赞成与否,我想未来的任何学问家不能无视作者的这一努力,尤其当他(们)打算建立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宏伟大厦时。

同时,从跟作者商榷的角度,我想说一点不成熟的、也许有点悲观的看法。据我估计,至少在可预期的将来,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还很难真正建立系统完备的学术构架,国际关系学确实还不是一门严谨独立的学科,国际关系的探索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将行进在深一脚浅一脚、缺乏方向感的沼泽或森林地带。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来自传统科学理论本身的局限,它约束着尚不成年的国际关系学的伸展力,使有限的、“符合条件的”领地显得孤独和创新力不足。像这本书的作者坦言的那样,诸如英国学派、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国际思想、世界体系论等流派学派,没有纳入考虑范围,主要原因是它们都不太适合前面提到的社会科学标准(如可证伪性、可预测性与变量的清晰界定等)。在这个条目后面,我可以补充非欧美地区的一些国际关系思想与解释、国际关系史上各种大大小小的周期理论、国际政治进化与学习的学说,以及方兴未艾的各种地区主义理论思想流派等。然而,恰好是这些晚生的、极不成型的、更谈不上成熟系统的探索,比较三大主流学说以及老的左派思潮而言,显得更加生气勃勃、生机无限,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其中,引起更多“非专业人士”的兴趣,产生了更多的嫁接努力和无法对号入座的成果与次领域。混乱与繁荣实际上一个硬币的两面,不是吗?新时代的科学学研究也发现,科学本身是有各种局限的,它在某些方向上更加严谨细致深入的同时,也容易妨碍、阻止另外一些发散式的、与精密实验类型无法吻合的发现和创造,所以现在的混沌理论和复杂性学说,更加强调非线性的、多维朝向的、与人的大脑和自然界的状态适应而与传统实验室思维有别的科学研究。科学思想的这一演化特点,值得引起宋伟博士和学界的重视。在我看来,不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固化和教条主义的毛病(尤其经过掌权阶段的强化之后),其实看似新兴的三大主流学说亦有类似的倾向,即把曾经有效、至今有力的某些发展路径精准化、模式化、线性化、单一化,或多或少约束了更多看似杂乱无

章、实则含有创新因子的摸索努力。国际关系学的这一现象,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存在,连最发达的美国也一样,它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许多美国有识之士依然不认可国际关系学是成熟、独立、边界清晰的理论学说。另一个原因深藏于中国本土。且不论古代丰富而智慧的知识(往往是微言大义的表达)在与当代学科自觉的对接方面,存在诸多难题,单从当代发展观察,中国国际关系学赖以生存和获取养分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包括丰富多样、成效显著同时问题重重的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实践,呈现给研究者的,可能是国际关系历史上最了不起也是最复杂的动态进步,非常难以用我们熟知的科学主义范式加以概括和描绘。面对这种局面,我们需要和能够做的,可能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鼓励更多哪怕是不成熟的探讨(包括“胡思乱想”),以及更有创意和开放性的学问框架,尽管这样可能产生不少负效果。这种情景好比我们从大块空白地带走来,进入了一片沼泽遍地、枝藤纠缠、天日不明、目难尽头的黑森林地带,此时的探路者,既要搞清楚所在位置极其危险,又要避免伐木辟径、只留大树的简单办法。不妨说,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处于一个进行式的状态,有无数必须长期面对的艰苦挑战,存在着对想象力、韧性和性情的考验——它像我们每个人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关系,因而最好用一种相对“混沌”、有弹性的态度应对之。乐观地预测,大概还得几十年,我们才有望见到真正的“共有知识”框架,见到知识社会学所讲的全新知识和方法论,见到比较完备系统的国际关系“学”。

转了一圈,似乎回到了原点,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对此,读者怎样批评,我都不太在意,都没有什么关系。这大概是人到中年的一种状态吧。可能正因如此,笔者十分赞赏宋伟博士的雄心壮志和努力进取,从他身上似乎看到二十多年前的自己,只不过这位年轻作者比我有更加严格的理论训练和写作规范,有更加缜密的经典研读和学术集成,有更加宏大的科学思维和学科志向。正所谓“后生可畏”。

期待更多宋伟的出现!

王逸舟

于北大朗润园寓所

2011年3月13日

致谢

写作一本系统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书,是我进入北大学习国际关系专业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具体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书,但我想完成的任务是:用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建立一种有关国际关系学科的系统性认识。这个学科是怎么来的?理论如何界定?现有的、得到公认的国际关系理论好在哪里?它们是如何被创造和锤炼出来的?对于仍然相当缺乏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训练的中国国际关系专业学生而言,只有理清了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算真正对国际关系“入门”了。

当然,任何解释都不会是完美的;我在书中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也只是初步探索。这一探索无疑是艰苦的,有时甚至是孤独的。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院长和各位领导、老师为我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环境;感谢国际关系学界许多前辈、同仁一直以来对我的指点、鼓励和帮助;特别感谢王逸舟老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特别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董龙凯先生严谨、细致的工作,以及为本书所倾注的巨大心血和精力。最后,我要把最衷心的感谢送给我的父母宋文海先生和彭满吾女士,以及我的爱人冀立娟。我的父母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善良的人格、对知识的尊重和对我的期望永远激励着我。我的爱人冀立娟虽然工作很辛苦,但依然照顾好我的生活,并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衷心感谢我的家人,你们永远是我前行的最大动力。

宋 伟

于北大燕园

2011年7月

目 录

CONTENTS

序	1
致谢	1
导论 社会科学视角的国际关系学科	1
第一章 社会科学标准与国际关系理论	9
第一节 社会科学理论的性质、结构与方法	10
一、社会科学理论的性质	10
二、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构	18
三、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	27
第二节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45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问题	47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领域	51
三、国际关系理论的横向拓展	54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纵向拓展	57
本章小结	60
第二章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65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	68
一、物质主义的世界观	69
二、关于国家层次的基本假设	81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理论硬核	87
一、核心概念：国际结构	88
二、主要逻辑：国际结构决定国际体系的稳定性	97
第三节 现实主义的理论推论	102

一、国际体系结果的推论·····	103
二、外交政策行为的三种推论·····	118
本章小结·····	153
 第三章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156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概述·····	157
第二节 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167
一、传统自由主义的理论范式·····	168
二、传统自由主义的理论硬核·····	183
三、传统自由主义的理论推论·····	191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198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范式·····	200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硬核·····	204
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推论·····	214
本章小结·····	226
 第四章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228
第一节 建构主义的理论范式·····	232
一、理念主义世界观·····	233
二、关于国家层次的假设·····	239
第二节 建构主义的理论硬核·····	244
一、核心概念:国际规范·····	246
二、主要逻辑:国际规范决定国际体系的稳定性·····	258
第三节 建构主义的理论推论·····	261
一、国际体系结果的推论·····	262
二、外交政策行为的推论·····	267
本章小结·····	277
 结论 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估、启示与方向·····	283

导论 社会科学视角的国际关系学科

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恩格斯^①

大体来说,我们把学科分成两类——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目的是力图解释某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例如为什么苹果会落地、什么时候彗星会经过地球。科学所解释的这些现象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因此科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使我们能够预测未来。例如,如果把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就包括:战争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反复出现?民主国家之间真的不打仗吗?当然,科学研究也会关注某些异常现象,并解释其原因,但不会把个案及其独特性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与历史学的研究相比,科学研究关注的细节更多是关键性的、能揭示某种因果关系的,而不是作一种纯粹的、详尽的过程描述,虽然这种描述可能很生动、很吸引人。包含历史学科在内,人文学科可能更多地促进我们的人文关怀、提升我们欣赏美的水平、陶冶我们的情操。不管是舞蹈、音乐还是绘画,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来

^①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467页。

说,它们所采取的更多是理解的方法,是一对一的教学传授和潜移默化,每个人对美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当然,这是一个对学科知识的粗略划分,科学和人文从本质上来说是互相交融的。

的确,好的科学理论往往是美的,而且是一种简单、深刻的美;好的艺术可能也贯彻了诸如黄金分割这样的科学原则。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许多哲学家认为美意味着和谐,而天地宇宙所体现的乃是美的最高境界。庄子曾经说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从球形是最完美几何体的观点出发,认为大地是球形的,提出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作均匀圆运动的思想。他还认为10是最完美的数,所以天上运动的发光体必然有10个。他在音乐与数学之间建立了联系,认为数学应该是物理学以及美学的根本研究对象。^①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看来,最完美的曲线是圆,所以所有的天体都是以圆轨道运行的。他更热情讴歌了宇宙的这种和谐之美:“这宇宙所以能历久不坏的原因,在于诸元素的和合;肇致这和合者,则在于各得其平的比例……重的与轻的是平衡了的,热的与冷的是平衡了的。这样,自然教给了我们,这世界的大道理就在平等;万物既全出于宇宙,宇宙实万物之尊亲,也是一切美善的总归。”^②既然宇宙自然本身是美的,那么研究其运动的内在规律的科学知识也应该是美的。也就是说,科学结论在表现形式上,应当具有自然本身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和谐与对称,给人以美感。对于研究科学哲学的学者来说,他们把这个称作“简约性”。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著名的质能方程式 $E = mc^2$,把质量与能量的关系用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内在的科学美学价值被物理学家波恩(Max Born)称为“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不仅如此,科学的进步是实现人类生活的进步、人的解放的重要条件。“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

①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2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天象论 宇宙论》,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0页。

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①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更是把科学技术放在了第一生产力的显著位置。“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②

除了作为物质文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③科学的进步使得人们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因此,科学理论的发展对于技术和社会这两者的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有学者断言:“在人身上,科学、技术、文化和整个历史发展的主要力线交织在一起。很明显,人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因素综合决定的,在这些因素中科学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④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指出:“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⑤事实上,作为揭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不仅凝聚了人类的实践经验、智力思考,也体现了创造这些科学知识所必须具有的伟大人类品格:谨慎周密、温和冷静、勇于创新、勇于坚持、绝不盲目迷信,等等。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旦这些领域积累了

① 中国人民大学编:《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212页。

②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275页。

③ 【英】W. C. 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44页。

④ 【苏联】弗罗洛夫著:《人的前景》,王思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⑤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越来越多的实证材料,对许多具有内在联系的现象了解越来越多,那么出现系统的科学理论知识就不可避免。这些系统的理论知识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就称之为某门“自然科学学科”或者“社会科学学科”。这些学科一般都有自己集中的研究领域,有专门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有自己关注的核心问题。相比前科学理论时期那些零散的思想火花和规律总结,科学理论的力量在于准确和可操作的概念变量、清晰严谨的因果关系,以及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所具有的较为普遍的解释能力。正如两位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A. Frieden)和戴维·莱克(David A. Lake)所指出的,只有当国际关系是一门科学时,它才能作出最大和最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在系统的实证考察基础上,提出论证充分、内在一致和说服力强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是为某些规律、“法则”或者其他看起来无可置疑的联系找到经验证据。“只有当国际关系进行科学探讨时,它才可能提供某些具有长远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基于消息灵通的见解。”^①因此,从科学知识发展成为科学理论,意味着在某一领域已经出现了专业研究者,该领域的学科已经初步形成。

和其他社会科学诸如经济学、社会学一样,国际关系学如果能成为一门学科,那么一定是因为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并且这些理论和其他非专业的理论方法相比对于本领域——国际关系领域——多数重大事件有着最强的解释力。只有这样,它才能被承认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否则就可能只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毕竟国际关系不太可能成为一门纯人文学科。一门社会科学总是先界定自己的解释领域,然后提出相应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因果关系去解释某些规律性的现象。这些核心概念、因果逻辑就构成了本学科的共同知识。例如在经典物理学领域,牛顿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就构成了其他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牛顿建立了经典物理学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完整理论体系,不仅能说明已有的理论已经说明的现象,如充分解释伽利略发现的惯性定律和自由落体定律,而且能说明并解释已有的理论不能说明的现象,如充分解释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因此,对于物理学家而言,这些科

① Jeffr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Rigor and Releva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600(Jul. 2005), p. 151.

学定律就构成了他们分析物理现象、进行交流的共同知识基础。

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这三大主义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掌握,构成了国际问题研究者们共同的知识基础。虽然他们在从事某项具体研究工作时,从三大主义中受到的启发不同,所采用的核心概念不同,对于主变量和次变量在具体问题上的结合也看法不同,但这些共同的知识基础构成了他们作为国际问题研究者专业性的基本特征。这并不是说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不能运用市场、族群这样的概念。但如果仅仅使用那些没有转换为国际关系专门术语的其他学科概念,他们一定不会被认为专业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得出的结论也容易受到批判。例如,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们往往用一个“地盘性”(Territoriality)的概念,来说明动物对自己地盘的敏感性。但是,这样一个概念运用于国际关系中时,就必须转换为“主权”的概念。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经过相当的理论思考,没有所研究因素的锤炼、概念化,对因果关系的反复检验,即使是最聪明的大脑,所能提出的也还停留在比较粗糙的思想火花的阶段。这就比如一个日本人和一个美国人住在一起,可能发现对方的很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自己不一样——诸如日本人喜欢安静,而美国人爱听摇滚乐,从而出现了摩擦,这个日本人可能意识到习惯、观念的差异会带来冲突,但不太可能得出结论说日本和美国的差异主要在于两国观念的差异。这期间还要经过对习惯、观念、思维方式等因素进行适合于国际关系领域的概念化,以及对于因果关系的严格考察,例如,在什么条件下国家间观念差异将成为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

国际问题研究朝着一门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政策意义。美国学者杰弗里·弗里登和戴维·莱克还指出,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国际关系学最有用的状况可能是那些经过严格的理论和实证检验的科学发现。只有发展出“纯粹的理论”,在合理的前提下进行逻辑推导,把直觉置于对精确证据的要求之下,依据这些结论的核战略家、政策制定者和公民们才能在巨大的危险下找到安全——合理的安全。^①不管是现实主义、自

^①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Rigor and Releva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600(Jul. 2005), p. 141.